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曹卫东 主编

跨文化研究

TRANSCULTURAL
STUDIES

齐奥尔科夫斯基

库尔提乌斯与中世纪拉丁研究

盖 莱

库尔提乌斯的主题学与文学批评方法

卡 林

欧洲文学的连续性

——论库尔提乌斯

杨 林

重建艺术与生存世界的本源联系

——“身体”视角下的尼采美学研究

高利克

斗士与妖女

——茅盾视野中的参孙和大利拉

杨风岸

文化使命与范式建构

——重读 I.A. 理查兹的文学批评

总第 2 辑

(2017 年第 1 辑)

跨文化研究

TRANSCULTURAL
STUDIES

总第 2 辑
(2017 年第 1 辑)

曹卫东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研究·总第2辑, 2017年·第1辑 / 曹卫东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7
ISBN 978 - 7 - 5201 - 1011 - 2

I . ①跨… II . ①曹… III. ①文化交流 - 文集 IV.
①G11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920 号

跨文化研究 总第2辑 (2017年第1辑)

主 编 / 曹卫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刘 娟

责任编辑 / 刘 娟 孙连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011 - 2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跨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跨文化研究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顾问：乐黛云 刘小枫

主编：曹卫东

本期执行主编：胡继华

中方编委（按照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曹卫东 曹顺庆 常耀华 陈太胜 陈戎女 程 巍

高建平 耿幼壮 李瑞卿 刘 燕 胡继华 潘先军

邱 鸣 王柯平 汪民安 杨乃乔 杨 平 院成纯

张 辉 郑承军 周启超 周志强

国际编委：

Timothy Bewes (美国布朗大学英语系文学批评教授)

Lionedas Bargeliotes (希腊雅典大学哲学系古典学教授，奥林匹亚文化中心主任)

Rick Benitez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古典学教授)

Galin Tihanov (英国伦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Thomas Robinson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和古典学教授)

本期编辑助理：王逸伦 贺宥姗 李静静 武淑冉

目 录

· 经典论绎 ·

库尔提乌斯与中世纪

- 拉丁研究 齐奥尔科夫斯基 (Jan M. Ziolkowski) / 1
库尔提乌斯的主题学与文学
批评方法 盖莱 (Alexander Golley) / 25
欧洲文学的连续性
——论库尔提乌斯 卡林 (William Calin) / 40

· 尼采新解 ·

重建艺术与生存世界的本源联系

- “身体”视角下的尼采美学研究 杨林 / 57
尼采回归经验世界的路径 院成纯 / 66

· 异邦视野 ·

斗士与妖女

- 茅盾视野中的参孙和大利拉 高利克 (Marián Gálik) / 80
构图第三世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报告
文学和散文 罗福林 (Charles A. Laughlin) / 96

· 文论前沿 ·

文化使命与范式建构

- 重读 I. A. 理查兹的文学批评 杨风岸 / 111

天堂中的拉比和地狱里的领唱

——论 I. L. 佩雷茨新哈希德小说中的共同价值

和犹太精神 包安若 / 129

西方文论：知识建构或绝对镜像 石天强 / 143

· 新著揽英 ·

德里达与解构主义批评近观 李雯君等 编译 / 150

· 经典试译 ·

边 框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 170

《跨文化研究》稿约 / 182

Abstract / 184

库尔提乌斯与中世纪拉丁研究*

齐奥尔科夫斯基 (Jan M. Ziolkowski) / 文

林振华/译

摘要：本文首先指出了库尔提乌斯的名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与同类名著的差别，然后从学术谱系、教学研究等方面分析了库氏与中世纪拉丁学术的关系。针对欧拉遇到的种种批评，作者评述后认为，库尔提乌斯的贡献仍然继续激发知识的新积累、新综合与新分析，库氏预想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建构或重构终将到来。

关键词：库尔提乌斯；中世纪拉丁研究；欧洲文学；语文学

如今，人们习惯把保守原则与创新原则相对立。从这一做法中，我看
到的只是混淆概念。没有创新的保守，跟一味的颠覆一样，徒劳无益。^①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 – 1900) 等人曾把学术的演变同金字塔的建造联系起来：学问的石块单个看来价值不大，堆叠起来却可以组成金字塔，不管是孤军奋战的学者，还是同心协力的学术圈，大家总是努力搜罗这些石块。^② 然而，这一意象存在缺陷。首先，它难以传达学术研究的乐趣。就内容

* 本文原题为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 – 1956) and Medieval Latin Studies”，载 *Journal of Medieval Latin* 7 (1997)，pp. 147 – 167。作者齐奥尔科夫斯基教授欣然同意将文章译成中文并收入本刊，在此向他深表谢意。

① Quoted by Peter Dronke, “Curtius as Medievalist and Modernis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October 1980): 1103 – 1106, at p. 1105.

② 对于这一隐喻的重要例证，参见 Friedrich Nietzsche, *Der Antichrist*, section 57, in “*Tw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trans. by R. J. Hollingdale (Baltimore, 1968), pp. 178 – 179, “A high culture is a pyramid: it can stand only on a broad base, its very first prerequisite is a strongly and soundly consolidated mediocrity”。这里感谢 Theodore J. Ziolkowski 的帮助。

而论，它把学者当成了受奴役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不怀好意的法老的淫威下，辛苦劳作。其次，它似乎还暗示，劳动者人数越多，训练越有素，金字塔就建造得越结实越牢靠。不过，对于某个学科，经过几代专家的努力，即便它的金字塔未见雏形，甚至寿命有限，他们仍可以建造起某些庞大而持久的东西。如果我们非要勾勒学术研究的建筑意象，那么它适合地下环境；很多人一直在忍受地下的生活，他们远离公众视线，为我们都不敢保证的宏图伟业默默耕耘。（我们还可以想到尼采的另一个意象——从未见过阳光而盲目掘土的鼹鼠^①）即便是在大众创作中不时爬上地面的作家，很多也无法构筑比戏剧舞台更坚实的建筑，须知舞台看起来牢不可破，可一旦演出结束，便四分五裂或轰然倒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屹立不倒的建筑，毕竟世上出现过难得一遇的思想家，其表达学问和洞见的方式离不开金字塔形态，其著作不但有公众号召力，而且一经问世就体现出持久的价值。以我所知的中世纪文学领域而论，至少有五本名著在英语世界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问世四十多年后，它们仍然以平装本形式流通于市。^②按出版先后顺序排列，它们分别是克尔（W. P. Ker, 1855 – 1923）的《史诗与传奇——中世纪文学论集》（*Epic and Roman: Essays on Medieval Literature*, 1908）、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 1860 – 1963）的《乔叟及其诗作》（*Chaucer and His Poetry*, 1915）、沃德尔（Helen Waddell, 1889 – 1965）的《漫步的学人》（*The Wandering Scholars*, 1927）、刘易斯（C. S. Lewis, 1898 – 1963）的《爱的讽喻——中世纪传统研究》（*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1936）和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1948）（以下简称《欧拉》）。^③

① See “Nietzsche on Classics and Classicists (Part II),” selected and trans. by William Arrowsmith, *Arethusa* 2/3 (1963), pp. 5 – 27.

② 有关库尔提乌斯著作的出版史和翻译史情况，参见 Peter Godman, “Epilogue: The Idea of 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the Genesis of ELLMA,” in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by Willard R. Trask. Bollingen Series 36 (Princeton, 1990) pp. 599 – 653, at p. 599.

③ 我没有算上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他的《摹仿论》（*Mimesis*, trans. by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1950）并不是中世纪文学研究的代表作，而其另一部著作《文学语言及其在拉丁古代晚期与中世纪的受众》（*Literary Language and its Public in Late Latin Antiqu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Ralph Manheim, with a foreword by Jan M. Ziolkowski, Bollingen Series 74, Princeton, 1993）虽最近再版，但仍属于专业著述。最近，又有一部长盛不衰的中世纪文学与文化论著晋级经典平装本系列，即孔帕莱蒂（Domenico Comparetti）的《中世纪的维吉尔》（*Vergil in the Middle Age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Jan M. Ziolkowski, Princeton, 1997）。

在以上几本书中，库尔提乌斯的《欧拉》无疑是与众不同的。^① 第一，显而易见，此书是唯一一本从外文译成英文的著作。第二，尽管五本书都关注拉丁素材，但只有《欧拉》以拉丁文学或拉丁化（Latinity or Latinness），作为全书的内容和题目。库氏强调西欧的拉丁学员与教员所传播的写作技法及材料，由此《欧拉》全书不遗余力地尝试建构拉丁传统中的中世纪文学与后来欧洲民族文学之统一性的关联。其创新之处显见于“拉丁中世纪”这一似乎为作者自创的表述。^②

我们赋予《欧拉》特殊地位的第三个原因，是围绕该书及其作者涌现的研究团体〔有位学者称之为“库氏语文学”（Curtius-Philology）〕。^③ 由此可见库尔提乌斯与刘易斯之间截然不同的特征。例如，世人关注刘易斯生平，大多从其创造性和宗教性写作入手，从他与牛津的朋友圈和学术圈〔即所谓的“吉光片羽”（the Inklings）〕的联系入手，甚至还有人为此深入其个人生活；^④ 而针对库尔提乌斯及其影响的分析，更主要受其学术成就的推动——不仅有《欧拉》和《欧拉》之前撰写的论文，而且还有大量有关现代文学的文章。^⑤ 库氏的社交生活很难反映在平装本的著作中，他的个人生活也无法拍成类似《幻境》（*The Shadowlands*）^⑥ 的电影——根本就不可能搬上银幕！

最后，《欧拉》跟克尔、基特里奇、沃德尔、刘易斯的著作一样，无论

① 关于《欧拉》的巨大价值，见 André Vernet，review of *ELLMA*,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12 (1950): 377 – 387, at p. 378: “Il ne saurait être question d'apprécier dans le détail un travail aussi dense, ni de scruter chaque Pierre d'un édifice aussi imposant… Nous nous contenterons de passer en revue les thèses principales, d'apporter quelques pierres…”（面对雄伟的建筑，我们不可能仔细检查其每一块砖石；同样，面对浩大的工作，我们不可能品评其每个细节……我们会很高兴地检阅主要论题，做些添砖加瓦活儿……）

② 《欧拉》问世之初，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吸引了读者，参见 Friedrich Panzer, review of *ELLMA*,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70 (1950): 109 – 115, at p. 109。关于库尔提乌斯自创该表达方式的猜想，见 Dronke, “Curtius as Medievalist and Modernist,” p. 1103.

③ Ulrich Wyss, “Mediävistik als Krisenerfahrung.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m 1930,” in *Die Deutschen und ihr Mittelalter. Themen und Funktionen moderner Geschichtsbilder von Mittelalter*, ed. by Gerd Althoff (Darmstadt, 1992), pp. 127 – 146, 206 – 210, at p. 137.

④ Humphrey Carpenter, *The Inklings: C. S. Lewis, J. R. R. Tolkien, Charles Williams, and Their Friends* (London, 1978).

⑤ See Hans Helmut Christmann,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n Romanisten*, Mainz: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Abhandlungen der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lasse*, Jahrgang 1987, nr. 3, (Stuttgart, 1987), and Stefan Gross,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 Romantik der zwanziger Jahre; zum Problem nationaler Images i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Aachener Beiträge zur Komparistik 5 (Bonn, 1980).

⑥ 一般译为《影子大地》，于1994年上映，是根据刘易斯的情史改编的电影。

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仍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其他书都没有像《欧拉》那样，开创了一种研究方法，并直接衍生出难以数计的文章和论著。《欧拉》注重细节，几近锱铢必较，其每个章节都考察一个主题，作者点到为止，若深究起来，完全可以扩展成一部专著（事实也的确如此）。^①

即便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理论之风、方法论之风横扫北美人文学科之际，库尔提乌斯的《欧拉》仍堪称思想、智慧、知识的宝库，被饱学之士置于案头，作查阅或引述之用。1976~1983年，五十本引用量最大的20世纪人文艺术类出版物目录中，库氏的鸿篇巨制不仅是围绕中世纪的唯一论著，而且还是明显以某个时期为对象的唯一论著〔巴赫金的《拉伯雷及其世界》(Mikhail Bakhtin's *Rabelais and His World*)^②稍有例外〕。《欧拉》排在第十位，前九位分别是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的《句法理论面面观》(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物之序》(Order of Thing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S/Z》以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③

然而，以对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关注而言，若比较其他同领域的专家，库尔提乌斯便很难出其右。在本文中，我将考察这一矛盾状况的根源和本质。为此，我会首先回顾库氏对当时中世纪拉丁研究的展望，然后介绍《欧拉》德文版和后续译本问世后评论家的接受情况，最后阐述《欧拉》对近年来中世纪拉丁研究的影响。不过在此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梳理库氏那

^① Earl Jeffrey Richards搜集了受库氏启发而撰写的大量著作，参见他的*Modernism, Medievalism and Humanism: A Research Bibliography on the Reception of the Works of Ernst Robert Curtius*,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196 (Tübingen, 1983)。

^② Trans. by Hélène Iswolsky (Cambridge, MA, 1968; rep. Bloomington, 1984).

^③ Eugene Garfield, "A Different Sort of Great-Books List: The 50 Twentieth-Century Works Most Cited in the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1976~1983," reprinted from *Current Contents* 16 (20 April, 1987), pp. 3~7, in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1989 Second Semiannual*, vol. 1, "Guide & Lists of Source Publications, Citation Index A to Z"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1990): 7~11, at p. 8.

个年代以及当今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的素养问题。

“中世纪拉丁学专家”（Medieval Latinist）这个术语，比很多与其相近的同类语都要模糊。譬如，当今学界常用“古典学者”（Classical）指热衷古希腊罗马文化，并由此展开广泛研究且想得古典学学位的人。^① 古典拉丁学者大多能通过古典学研究项目获得重要证书，极少有例外；而中世纪拉丁学专家^②的情况就不可相提并论了。不少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要么是按时间顺序追踪拉丁语言、继承古典遗产的古典学者，要么是从民族语言与文学系或历史系平移到拉丁语方向的中世纪研究者。

如果说非得取得中世纪拉丁语专业的学位，或者担任类似中世纪拉丁语导师的职位，才能成为中世纪拉丁学专家，那么库尔提乌斯就担不起这个称号。把中世纪拉丁学专家限定得如此狭隘，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此一来，就会排除该学科的奠基者，以及许许多多为重构和阐释中世纪拉丁文本而编纂字典、考订版本、著书立说的学者。

在 19 世纪初的欧洲与北美，学生正式学习的唯一文学是古典文学，学习时他们要进入古典语文学的语境。整个 19 世纪，欧洲的民族文学尤其是以中世纪表现形式示人的欧洲民族文学，激发大家沿着语言学线索创立不同的语文学——譬如德国语文学、罗曼语文学和英国语文学。

既然这一文化举措针对中世纪，那么中世纪拉丁语文学理应居于核心地位；可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头十年，它才成为独立的学科。^③ 的确，1902 年，被学界誉为“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创始人”的特劳贝（Ludwig Traube, 1861 – 1907）^④，晋升教授；是年，他接受了官方授予的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之职。^⑤ 此时，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已先后成为罗曼语文学与古典语文学的附

^① 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 2nd ed. (New York, 1995) 对该词的定义如下：“一、提倡或遵循古典主义的人；二、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学生或专家；三、提倡在学校推行古希腊语、拉丁语教学的人。”其中，第二个定义从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中删除了。

^② 按照 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 的解释，拉丁学者指“擅长拉丁语的人”；*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将其释义为“一、精通拉丁语言的人；拉丁语学者”。

^③ Karl Langosch,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Einleitung in Sprache und Literatur* (Darmstadt, 1983), p. 13.

^④ 详见 Siegmund Hellman, “Das Problem der mittellateinischen Philologie,” *Histori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29 (1935): 625 – 680, at p. 625。同样的假设还见于 *Tradition und Wertung. Festschrift für F. Brunthölzl zum 65. Geburtstag*, ed. Günter Bernt, Fidel Rädle, and Gabriel Silagi (Sigmaringen, 1989)；此时出版，恰逢特劳贝首次发表中世纪罗曼文学讲座一百年。

^⑤ Ernst Robert Curtius, “Gustav Grö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in Ernst Robert Curtiu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Bern and Munich, 1960), pp. 428 – 455, at p. 618, n. 2.

庸。^① 即便后来它仍微不足道，并且发展缓慢。

中世纪拉丁学专家，指那些研究创作于中世纪的拉丁文献的学者；如果忽略了这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我们的定义工作就寸步难行。术语含糊不清，势必导致困难重重，因为“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虽点明了研究者所要研究的素材语言，却对研究方法语焉不详。相反，“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Medieval Latin philologist）这个术语，既指明了研究素材（中世纪拉丁文），又指明了研究方法（语文学）。故“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不如“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严谨。套用几何学中老生常谈的类比：一个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一个是长方形同时又是正方形。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都是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但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不一定都是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

库尔提乌斯感谢不同学科为理解中世纪所做的贡献，不过，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他尤其称赞语文学。例如，1949 年库氏参加了科罗拉多州阿思潘市举行的歌德两百周年诞辰大会，会上他评价了美国中世纪研究的发展情况。他指出了三位主要人物——“历史学家如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语文学家如比森（Charles H. Beeson）、兰德（Edward Kennard Rand）的工作，加深了世人对中世纪的认识”（《欧拉》第 587 页）。库氏提到两位语文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这个比例尽管不一定是有意为之，却能反映出他的一个假设，即研究中世纪拉丁文本与中世纪文化，必须从语文学入手。换言之，“偶然的事实真理只能借助语文学来获得。语文学堪称史学学科的婢女”（《欧拉》第 x 页^②）。

库尔提乌斯公开表示对“语文学方法”笃信不移，在《欧拉》序言中，他甚至写道，自己的研究依靠“所有历史探究方法的基石——语文学”（《欧拉》第 x 页）。他讥讽有些人试图让文学屈从于艺术：“如果我们从天主教堂中就能掌握‘哥特时期的精髓’，就不必再阅读但丁了”（《欧拉》第 15 页）。在库氏看来，文本是思想交流的媒介，故占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③；他断言，没有语文学的帮助，文本就无法理解。没有语文学，文学批评不过是纸上谈兵，因为它缺少破解“困难”段落的技法（《欧

① Curtius, “Gustav Grö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p. 618 – 619.

② 文中类似页码均指《欧拉》英译本页码。

③ 针对库尔提乌斯观点持反对意见，参见 Clifford Davidson, “Curtius and the Primacy of the Book,” EDAM Newsletter: Early Drama, Art and Music 10 (1987): 1 – 6.

拉》第 15 页)。

库尔提乌斯似乎承袭了格勒贝尔的思想——视语文学为精确科学，对之尊崇有加，同时视之为获得真理与理解力之手段。为概括格勒贝尔对自己研究方向的影响，库氏讲述了格师如何引导自己知晓语文学的启示：“语文学即知识——不过，它是这么一种知识：我在一瞬间就直接把握到的知识。自此以后，每当遇到真正陌生的作品，我就会一再扪心自问：它对这种知识有何贡献？”^①。获此灵感，库氏极推崇古典语文学——语文学调查中最庄重最精致的分支，同时把它作为中世纪研究的典范。因此，他心悦诚服地援引小施莱格尔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 – 1845) 的质疑：“要想推动中世纪语文学的发展，就必须将古典语文学的原理运用其中” (pour faire avancer la philology du moyen age, il faut y appliquer les principes de la philology classique^②)。

不过，库尔提乌斯热衷语文学并不是盲目之举，也非执意而为。在《欧拉》英译本序言结尾处，他断言“语文学不是唯一目的”(《欧拉》第 x 页)。有时，他也暗示了语文学的种种不足。自 19 世纪维拉莫维茨 - 默伦多夫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1848 – 1931) 掀起一场论辩后，置身其中的古典学者壁垒分明。库尔提乌斯跟尼采一样，反对维氏；他批评古典语文学关注事实却忽视了思想。^③ 库尔提乌斯本人喜欢比较与批评，可当有人以定义之名把这些从语文学中排除出去，他就觉得语文学令人反感了。在他看来，抵制集思广益，不仅是保守的古典语文学的特点，而且也是 20 世纪中期“新语文学”(Neuphilologie) 的特点：“‘新语文学’起点有限，故而所谓拉丁中世纪的关系意涵必定令人匪夷所思。”^④ 在失望之极评价当时的学术机构时，库氏声称，语文学体系与文学研究已经跟 1850 年的铁路系统一样陈旧。^⑤ 这种落后的事态让他忧心忡忡，因为他认为，如此会危及“欧洲传统”的保存，而这被他视为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神圣使命：

^① “Gustav Grö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55.

^② “Gustav Grö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40 (这里转引了 Gröber 的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 Philologie*, 2nd ed., vol. 1, p. 103).

^③ *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Stuttgart, 1932), pp. 13 and 105. 感谢 David Ganz 允许我阅读“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Aby Warburg”一文，使我有机会注意到相关文字。

^④ “Gustav Grö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44; compare *ELLMA*, p. 13.

^⑤ *ELLMA*, p. 16.

“没有现代化的欧洲文学研究，就不可能考察欧洲传统。”^①

库尔提乌斯的学术训练及成就，是无法用“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家”或“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这些字眼来概括的。^②无论是哪个称号，都会从语言和时间角度误指他的领域，因为库氏站在拉丁文学之上，阐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学；走到中世纪之外，批评那时的当代文学，如黑塞（Hermann Hesse, 1877 – 1962）的《玻璃球游戏》（*Glasperlenspiel*, 1943）、艾略特（T. S. Eliot, 1888 – 1965）的《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同样，类似称号还会让人把库尔提乌斯盖棺定论为罗曼语言文学专家（Romanist）或罗曼语文学家，并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出于特殊的背景，库氏更愿意将欧洲文学视为文化连续体（cultural continuum），而古典与中世纪拉丁文本正是保证其统一性的关键所在。在《欧拉》英译本作者序言中，他开门见山地坦言自己学术兴趣的核心：“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罗曼语言与文学。”（第vii页）然而，他并没有为此马上圈定界限，因为他坚信，要想理解欧洲文学，就必须高屋建瓴地研究：“一旦我们成了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也便成了欧洲公民。然而，众多彼此无关的语文学把欧洲文学弄得四分五裂，要实现上述愿望几无可能。”（《欧拉》第12页）为此，理想的欧洲文学学人“只需熟知古典与中世纪拉丁语文学以及近代语文学的方法与主题”（《欧拉》第14页）。

在《欧拉》英译本序言中，库尔提乌斯表示，自己的著作“在具体历史环境的压力之下一点点完成”（《欧拉》第x页）。这里，库氏特别暗示了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及欧洲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们威胁着西方文化统一观的形成。然而，即便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环境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库氏的世界观，我们仍需指出，《欧拉》既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其作者自己思想背景的产物。尽管库氏本人并不赞成从传记角度考察学术著作的价值，但我们有充分理由以此考察他与中世纪拉丁学术的关系。

受家庭和早年求学环境的影响，库尔提乌斯很早就浸淫于中世纪拉丁

① ELLMA, p. 16. Quoted as the final words in M. L. W. Laistner, review of ELLMA, *Speculum* 24 (1949): 259 – 263; reprinted in Laistner, *The Intellectual Heritage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Selected Essays*, ed. by Chester G. Starr (Ithaca, NY, 1957; repr. New York, 1983) pp. 83 – 90, at p. 90. 关于库尔提乌斯之传统观念，参见 Claus Uhlig, “Tradition in Curtius and Elio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2 (1993): 193 – 207。

② Dronke, “Curtius as Medievalist and Modernist,” p. 1103.

文学，可他之所以能在中世纪拉丁文学领域打下系统而坚实的基础，乃得益于罗曼语文学家格勒贝尔的教诲；两人结识于研讨班，后来格氏成为库尔提乌斯的博士生导师（Doktorvater），两人的交情达到顶点。格师博闻强识，学富五车，唯有他才能以欣赏的眼光，向自己的罗曼语文学学生传授有关中世纪拉丁文学的知识。格勒贝尔写过一套卷帙浩繁的罗曼语文学百科指南；其中一卷名为《六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拉丁文学概要》（*übersicht über die lateinische Litteratur von der Mitte des VI. Jahrhunderts bis zur Mitte des XIV. Jahrhunderts*, 1902）。这本 335 页的著作回顾了中世纪拉丁文学——其内容紧凑，条理分明，自首次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仍是相关领域难以逾越的、不可或缺的扛鼎之作。

从传承关系讲，格勒贝尔是库尔提乌斯献身中世纪拉丁文事业的师父，而格勒贝尔的导师埃伯特（Adolf Ebert, 1820 – 1890）则是库尔提乌斯的师祖。埃伯特、格勒贝尔、库尔提乌斯之间存在很多家族相似性，其中之一即坚信身为罗曼语文学家，自己必须关注中世纪拉丁文学史；虽然他们关注中世纪拉丁文的做法引起古典语文学家的声讨或抵制，但三人决心已定，不会动摇。^① 在库氏对师祖的描写中，明显洋溢着推崇中世纪拉丁文文化精神的情怀：“三大要素构成了埃尔贝特辉煌的学术成就：领衔学术团队，文学史研究方法兼收并蓄的品格，以及涵化中世纪拉丁文献于罗曼语文学领域。”其中，后一段话还被库氏用于点评恩师的中世纪拉丁文学方法——库氏赞誉其“涵化中世纪文献于罗曼语文学领域”。^②

尽管库尔提乌斯在恩师的纪念文章中感念埃伯特与格勒贝尔对自己的教诲，但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受格师影响，将长期致力于中世纪研究。库氏完成自己有关古法语文学的博士论文后，花了 20 多年时间钻研现代文学。的确，在库氏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发表的著述中，唯有一篇名为《从吉伯特到诺根特》（“Zu Guibert von Nogent”，1913）的文章，暗示了他对中世纪拉丁文的兴趣。然而，若就此认为《欧拉》未经任何准备便横空出世，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早在 1936 年，库尔提乌斯就开始发表大量有关中世纪文学作品的论文；1938 年，他发表了

^① “über die altfranzösische Epik,”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64 (1944): 233 – 320, at pp. 237 – 238; repr. I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Bern, 1960).

^② “Gustav Grö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44.

中世纪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一篇，而这些文章日后构成《欧拉》的主要框架。^① 我们知道，库氏此前已 20 多年未触碰中世纪，其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专业水准肯定不及后来，可即便如此，我们仍很难评估库尔提乌斯到底怎样阅读中世纪拉丁文学，并掌握多少相关知识。^②

在《中世纪拉丁文学新史》（“Eine neue Geschichte der mittellateinischen Literatur”，1947）这篇评论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库尔提乌斯对 1946 年以前的中世纪拉丁文学史，有着敏锐的理解。该文点评了盖兰（Joseph de Ghellinck，1872 – 1950）的两本著作，同时结合格勒贝尔的《概要》、马尼提乌斯（Max Manitius，1858 – 1933）的三卷本《中世纪拉丁文学史》（*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1911 – 1931）、雷比（F. J. E. Raby，1888 – 1966）的一卷本《基督教拉丁诗歌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Latin Poetry*，1927）和两卷本《中世纪世俗拉丁诗歌史》（*A History of Secular Latin Poetry in the Middle Ages*，1934）、施特雷克尔（Karl Strecker，1861 – 1945）的简明《中世纪拉丁文导论》（*Einführung in das Mittellatein*，Berlin，1928；2nd. ed. Berlin，1929），指出盖氏著作的文献地位。在 20 世纪整个 20 年代或 30 年代早期，库尔提乌斯把这些拓荒者收入各种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纪念集〔譬如 1931 年 9 月 4 日献给施特雷克尔的《礼物》*Ehrengabe*〕^③，这着实不可思议，因为一般认为，那时他几乎是完完全全的现代主义者；不过，考虑到 30 年代末期库氏展现出深厚的中世纪拉丁文学功底，那么当他在十年后的 1941 年为施特雷克尔八十大寿《纪念文集》（*Festschrift*）撰文（《论中世纪文学的主题》，“Beiträge zur Topik der Mittelalterlichen Literatur”），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库氏也是拓荒者，这表明他的中世纪拉丁文学学识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段欧洲文学史，正如他坦言，“仅有屈指可数的专家从事相关研究（即所谓的‘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在欧洲，可能有十余人”（《欧拉》第 13 页）。

在《欧拉》末尾的参考书目概览中，库尔提乌斯用两个段落重申了

① “Jorge Manrique und der Kaisergedanke” 也是《欧拉》前期研究成果之一，若把该文也算上，那么这一系列论文就始于 1932 年。

② 库尔提乌斯在 1932 ~ 1933 冬季学年开设的中世纪拉丁文学讲座中，使用了 Beeson 的 *A Primer of Medieval Latin*，参见 Lausberg, Ernst Robert Curtius, p. 156。

③ *Studien zur lateinischen Dichtung des Mittelalters: Ehrengabe für Karl Strecker zum 4. September 1931*, ed. Walter Stach and Hans Walther (Dresden: Wilhelm und Bertha v. Baensch Stifung, 1931).

1946 年评论文章的要点。更重要的是，他在《欧拉》英译本作者序言中，详细阐述了引导自己走向拉丁中世纪的政治信念与思想灵感。按照库氏的说法，他撰写了论辩小册子《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1932)，以此抨击“预示纳粹统治教育的弃智倾向以及民族主义狂热”(《欧拉》第 vii 页)。^①为替代弃智倾向以及民族主义狂热，库氏寻求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以整合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中世纪(《欧拉》第 viii 页及第 597 页)。他坦言自己对这种新人文主义的憧憬，是受美国人兰德(Edward Kennard Rand)的《中世纪的奠基人》(*Founders of the Middle Ages*)之启发。^②

像本文这样的研究，反映的是库尔提乌斯等人所谓“针对研究者之研究”(Erforschung des Forschers)的过程。^③在库氏看来，对学者的学术考察，不仅包括他们发表的著作，还包括他们的教学主张、教学态度以及研究方法。例如，哲学家德罗比施(Mortiz Drobisch, 1802 – 1896)年事已高方肯退休，发现这一点后，库氏点评道：“对于‘研究主体之研究’，类似陈述绝非可有可无。”^④

通过诸如此类的主张，库尔提乌斯仿佛提请将来研究自己的学者，注意其执教生涯。而这样的研究结果，也的确有助于勾勒库氏的中世纪拉丁研究的背景，因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从研究和教学两方面，努力夯实自己的中世纪拉丁文学知识。自先后任教于马尔堡大学(1920 ~ 1924)与海德堡大学(1924 ~ 1929)后，库氏又于 1929 年来到波恩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尽管他生前一直开设中世纪文学与现代文学课程，但在他来到波恩不久，在他发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不久，两门课程的比例就发生了变化。1932 ~ 1933 年，库氏先开设了《中世纪拉丁文学》(Lateinische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系列讲座，1941 年又增加了《中世纪拉丁文练习》(Mittellateinische übungen)，1947 ~ 1948 年发表了讲义式书稿《欧洲文学与

^① 有关从《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到《欧拉》过程中库尔提乌斯的思想变化，参见 Dirk Hoeges, *Kontroverse am Abgrund: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Karl Mannheim: intellektuelle und „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94), pp. 139 – 209。

^② *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p. 126, n. 12 中，库尔提乌斯的评论可以加以佐证，参见 Heinrich Lausberg,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 – 1956)* (Stuttgart, 1993), p. 111。

^③ “Gustav Grö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28. 库尔提乌斯确认了这一过程的有效性，此前 Hugo Schuchardt 已有过表述。

^④ “Gustav Grö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29.